



2023年，湖南省宁远县大元自然村的大元社艺术文化交流中心。志愿者通过艺术活动与留守儿童互动。

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读书，或者需要住宿，无形间跟家里父长辈的接触也少了，“这代留守儿童面临的依恋断裂更严重”。另一方面，随着网络的普及，信息变得多样，现在的留守儿童回到家可能更沉迷网络，也比以前更不听话了。

两位专家都认为，犯罪与否跟年龄没有太大关系。青春期的孩子由于情绪比较躁动，做事不计后果，比起成年人，一旦犯罪可能更“腥风血雨”，更残忍，“但我们也不要污名化留守儿童”。

“为什么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容易犯罪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更容易遇到挫折。受制于社会资源或自身教育水平，他们在满足的需要的过程当中就更加容易受挫折，以至于把这样一种挫折归咎于社会不公平。”崔丽娟解释道，这种情绪若对外，就容易产生愤怒，导致人容易犯罪；若情绪向内的话，就容易产生抑郁，甚至自杀。

如何预防？

近日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行“儿童早期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”专家座谈会。在主旨演讲中，芝加哥大学教授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·赫克曼从非认知技能发展视角，解释了留守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。

所谓非认知技能，指的是个体在心理学和经济学方面进行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，也叫执行功能，包括行动前的认真思考、管理愤怒、抑制冲动等。如果人们能在正确的时间、地点很好地应用非认知技能，则可能避免许多激情引发的暴力事件发生。

赫克曼教授介绍了美国自1962年就开始实行的一项社会实验——“佩里计划”。其实验对象是当地有色人群、低收入人群和单亲家庭的3至4岁儿童。实验者把同等智力水平的孩子随机地分为两组，对实验组进行每周五天的开放式教学与每周一天的教师入户家访，并鼓励家人与孩子交流沟通。

从1962年至今，实验团队追踪受试孩子50余年。“佩里计划”的目的是测试早期教育对孩子日后发展的影响。实验结果表明，实验组孩子在其日后的发展上许多方面胜过对照组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长期的追踪数据也表明，实验组的孩子犯罪活动的参与率显著降低，而且即便有犯罪行为，其程度也较轻。

“佩里实验”证明了提升儿童早期养育惊人的效果与影响，也告诉人们，“坏孩子”并非天生如此，对儿童进行早期干预，能够从生理和心理等多个层面提高个体适应社会的技能，进而提升其与外界互动的质量，甚至避免许多犯罪的发生。

事实上，在充满人际互动的现代社会中，任何人都不是社会议题的局外人。

根据2023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，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.56万。这就意味着，目前仍有1550万个16岁以下、连续三个月以上由农民父母托留在户籍地家乡，通过父、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的少年儿童。

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家，崔丽娟觉得应该担负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社会使命，这也是她致力于研究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与反社会预防的动力。

“让留守儿童觉得通过努力需求可以达到满足，只要有这种期望感，就可以降低他们犯罪的可能。”崔丽娟表示，现在各个部门，包括民政、妇联、共青团，还有一些企业，其实都在持续帮助留守儿童，“但仍存在一些地方重复救助，一些地方救助空白的情况，管理效率很低，如何让各个责任主体间不要相互孤立，能有一个组织统筹来让每个留守儿童尽可能都能从中得到社会支持，我觉得很重要”。

尹琳则提出，政府层面从经济政策的角度，可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，让人们能就地就业；学校层面要加强对孩子的生命教育；从家庭本身，如果父母要外出打工，需要建立一个“监护代理制度”。

“现在一般是委托给家里的老人，但我觉得发挥不了作用。是不是可以让村委会，或者村里比较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代理监护人？”尹琳表示，此外还需要增加留守儿童课余健康的娱乐活动。📺